

專輯論文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基於中國大陸12份報紙內容的比較研究

周葆華、呂舒寧

摘要

「新媒體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必須藉由傳統媒體進入公共議程。本研究通過對中國大陸12家報紙的內容分析(樣本量 = 2,534)，以「議程多元性」為核心概念，實證地考察傳統媒體對「新媒體事件」的報導情況。總體上，新媒體事件已經成為中國報紙新聞報導的重要內容，不過具體的滲入程度因地區發達程度、新聞範式不同而異。報紙所在地區越發達，其報導的新媒體事件數量就越多；相對於黨報，都市報在吸納新媒體事件時明顯更積極。都市報在議題、類型、地域分布上的內部多元性都要高於黨報。新媒體事件本身的整體外部多元性較高，而越是內陸，當地黨報和都市報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越離散，東部發達地區黨報和都市報的新媒體事件報導融合度則更高。相比於黨報，各都市報之間的趨同性更強。研究並對如何進行更深入的「新媒體事件」比較研究進行了討論。

關鍵詞：新媒體事件、議程多元性、新聞範式、地區差異、比較研究

周葆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兼院長助理，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興趣：新媒體與社會、受眾與傳播效果、社交媒體數據挖掘、輿論研究等。
電郵：zhoubaohua@yeah.net

呂舒寧，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學院博士生。研究興趣：新聞研究、新媒體。電郵：lvshuning@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6年3月2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7年2月13日。

Special Issue Article

Exploring Agenda Diversity in New Media Ev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2 Newspapers across China

Baohua ZHOU, Shuning LU

Abstract

Mainstream journalism has reacte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media events in China.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s on agenda diversity as a core concept i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the news coverage of new media events (N = 2,534) reported in 12 Chinese newspaper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new media events, which are sometimes regarded as controversial and sensitive issues in China, were large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news coverage by mainstream newspapers. However,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newspapers covered such events was limited, unstable, and fragmented, depending on the newspapers' socio-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journalistic paradigms. In terms of internal diversity, newspapers in eastern China covered more diverse new media events than those in western and central China covered. Moreover, the internal diversity of new media events covered by the party media lagged behind those covered by market-oriented media. Furthermore, the discrepancy of internal diversity between party and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s in the same locality was much greater in central or western China than in eastern China. The analysis of external diversity revealed a fragmented pattern; more than four-fifths of all 1,488 new media events were reported by only one newspaper. The

Baohua ZHOU (Professor and Assistant Dean).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and society, audience and media effects, social media mining, public opinion.

Shuning LU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Research interests: journalism studies, new media research.

Exploring Agenda Diversity in New Media Events

newspapers in western and central China showed higher external diversity than those in eastern China.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s were more likely to converge in terms of their coverage of new media events, issues, and types than party newspapers we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new media event, agenda diversity, journalistic paradigm, China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ou, B., & Lu, S. (2017). Exploring agenda diversity in new media ev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2 newspapers across China.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 135–168.

致謝

本研究為國家社科項目「社會化媒體對轉型期中國社會輿論的影響研究」(編號：13CXW021)、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移動互聯網使用與城市公眾的生活方式」(編號：15JJD860001)的階段性成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新媒體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必須藉由傳統媒體進入公共議程，傳統媒體在促使「新媒體事件」走向網下、走近一般公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立峯，2009；周葆華，2011)。一方面，就中國公眾媒體使用的分布而言，截止2016年底網民的普及率不過53.2% (CNNIC, 2017)，意味著仍有相當部分公眾依賴傳統媒體獲取新聞；另一方面，傳統媒體依然具有象徵資源，使其傳播的內容具有更強的認知權威，甚至對事件走向、規模和迴響有顯著影響。如果說在「新媒體事件」崛起之初，相比於港、台社會，中國內地對「新媒體事件」的研究主要關注其在網路空間的形態與運作本身、較少涉及其與傳統媒體之間的互動(邱林川、陳韜文，2011)，隨著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互動日趨常規化——在宏觀層面上「媒體融合」成為國家戰略，在中觀層面上新聞機構紛紛從組織到內容形態上與新媒體「接軌」，在微觀層面上新聞從業者採納社會化媒體、在新聞生產中吸納網路題材(周葆華，2014)，「新媒體事件」越來越需要在一個「擴展了的媒介生態體系」中加以理解。因此，在當代中國社會新的傳播場景下，對傳統媒體如何報導層出不窮的「新媒體事件」的系統考察變得日益重要。

目前圍繞「新媒體事件」中新舊媒體關係的研究不僅數量少，而且偏向個案研究，缺少對傳統媒體吸納「新媒體事件」規模與分布的整體分析：傳統媒體(以報紙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報導了「新媒體事件」？總體的分布特徵(議題、類型、地域)如何？對這些問題缺少基礎性研究。由此也更缺乏不同媒體之間的比較：不同媒體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內部有多少差異？是偏好特定議題、類型還是均衡報導不同題材？不同地域、不同取向的傳統媒體之間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如何？有一些事件似乎吸引了傳統媒體的共同關注，成為競相報導的「新媒體大事件」，而另一些事件則只是部分媒體、甚至個別媒體的選擇，並因此湮沒無聞、成為曇花一現的「小事件」。那麼，到底傳統媒體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有多一致、有多差異？又有哪些因素影響了這種一致或差異？回到傳播研究的脈絡中，這些問題反映的就是新聞報導的「議程多元性」(agenda diversity)——即新聞媒體在報導公共議題時，藉由不同議題、新聞類別或新聞故事所構成的新聞議程的多元程度。因此，本

研究將運用這一概念，採用內容分析方法，系統檢視中國不同地區、不同取向的報紙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各自內部、以及相互之間的議程多元性。我們希望通過這一實證研究，深化有關「新媒體事件」中新舊媒體關係的討論，對「新媒體事件」的深度與比較研究做出貢獻。

「新媒體事件」的議程多元性

新聞媒體在報導新聞事件和公共議題中多元和一致的張力，一直是傳播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一方面，從「意見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的基本理念出發，新聞媒體及其報導的多樣性被認為是促進資訊與觀點多元、保障民主機制有效運行、及實現更廣泛社會目標的重要前提(Herman, 1985; Napoli, 1999)；另一方面，學者們也提醒，新聞議題的過於分化，無助於社會在有限的公共空間內形成共同關注的議程，無助於發揮傳媒整合社會的功能(Blumler & Gurevitch, 1995; Katz, 1996)。同樣，就「新媒體事件」而言，傳統媒體對它的報導如果只聚焦於少數事件(或事件類型、題材)，那諸多「新媒體小事件」就乏人問津，僅能停留於網路空間而無法通過傳統媒體的傳遞形塑更大的社會影響；但另一方面，由於網路上的事件層出不窮，倘若傳媒報導過於分散，又有失焦之虞，使得真正具有公共價值的新媒體事件無法獲得應有的關注。所以，是趨向多元還是一致，從規範角度而言並無定論，但首先必須釐清目前傳統媒體報導「新媒體事件」議程多元性的基本狀況及其影響因素。

基於新聞內容的議程多元性是媒體多元性概念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Roessler (2008) 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來闡釋「多元性」的內涵——宏觀層次主要考察媒介系統與所有制的多元性，中觀層次聚焦媒體機構及產品類型的豐富性，微觀層次則落腳於媒體的內容，包括議題/意見多元性、事件多元性、地理多元性、媒介再現人群多元性等。Napoli (1999) 對媒體「多元性」的定義則包括了來源(source，主要指所有權、員工構成等)、接觸(exposure，指受眾資訊接觸行為的多樣化)和內容(content，涵蓋節目形式、人口指標、觀點等)三個維度。遵循這一基本界定，有關「新聞多元性」(news diversity)的實證研究涵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蓋新聞報導內容的不同側面，例如選舉報導中所呈現的黨派多元性 (Takens et al., 2010)、電視新聞中少數族群的多元性 (Voinché, Davie, & Dinu, 2010)、國際新聞來源、地點和主題的多元性 (Choi, 2009)、報紙專欄署名文章的立場 (issue stand) 多元性 (Day & Golan, 2005) 等。

在新聞內容多元性的維度之中，「議程多元性」集中分析新聞報導議程集中與分化的程度。根據「議程設置」理論的基本思想，新聞議程的建構主要基於議題 (issue，如國內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商業、文化娛樂等) 的分布及其排序，但也擴展到其他範疇——如新聞故事或事件 (Boczkowski & de Santos, 2007)、新聞議題或事件的屬性 (attributes) (McCombs et al., 1997) 等。由於本研究對象是「新媒體事件」，所以我們將首先考察在「事件」本身層面上的議程多元性，同時考察事件所歸屬的議題、類型與地域的多元性。

Ferguson (1984) 將「議程多元性」的具體維度分解為三方面——「形式多元性」(nominal diversity)、「比例多元性」(attributive diversity) 與「範疇多元性」(field diversity)。其中，形式多元性指在一個時間點被認為是重要議題的數量，當某個社會單元 (social unit) 所認為重要的議題數量越多，那麼其形式多元性就越高；比例多元性則用於評估社會單元所認為重要的議題的差異性 (variance)，即對不同議題關注程度的分配，當分配程度越均勻，比例多元性就越高 (意味著媒體對不同類別的新聞議題都給予比較均衡的關注)；範疇多元性指個體所感知到眾議題之間相似度的距離，在內容多元性的研究中很少運用。

不過，無論形式多元性還是比例多元性，所考察的都是單個特定媒體內部報導不同事件或議題的多元程度，即議程的「內部多元性」(internal diversity)。林宛瑩、李立峯 (2010) 則通過回溯有關媒體政治平行 (Hallin & Mancini, 2004)、媒體間議程設置 (Roberts & McCombs, 1994) 的研究，強調在「內部多元性」的基礎上區分「外部多元性」(external diversity) 概念——即跳出單一媒體，考察處於媒體系統中的不同新聞機構之間的議程一致程度。他們綜合運用內部多元性與外部多元性的概念，分「每日」和「累計」兩個層次，實證分析香港電視新聞節目在報導本地、內地及國際新聞上的多元性差異。

就目前議程多元性的研究來看，大部分聚焦受眾 (Chaffee & Wilson,

1976; McCombs & Zhu, 1995; Peter & Vreese, 2003; Allen & Izcaray, 1988) 或媒體報導的一般內容 (Peter & Vreese, 2003; 林宛瑩、李立峯, 2010), 並主要集中於西方社會, 幾乎沒有針對中國大陸傳統媒體吸納新媒體事件議程多元性的研究。究其原因, 除議程多元性概念整體上探討尚不充分之外, 也可能與「新媒體事件」本身在大中華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特別發達有關 (邱林川、陳韜文, 2011)。由於中國大陸存在官方話語 (以傳統媒體為主要載體) 和民間話語 (以新媒體和人際傳播為主要載體) 的「雙重話語空間」(He, 2009), 公眾很難通過制度化的傳統媒體管道表達訴求和反映問題, 造成了網路空間的「另類媒介」色彩與「新媒體事件」的層出不窮。所以本研究考察中國大陸傳統媒體對「新媒體事件」報導的議程多元性, 不僅有助於深入理解「新媒體事件」發展過程中的新舊媒體關係, 而且對把握中國「雙重話語空間」的互動也具有潛在意義。

我們首先提出關於新媒體事件報導議程多元性的描述性問題：

研究問題一：「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內部多元性」(包括形式多元性和比例多元性) 總體如何？報導了多少新媒體事件？所報導的這些事件在不同議題、類型、地域之間的分布是集中還是分散？

研究問題二：「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外部多元性」總體如何？中國不同的報紙之間，關於新媒體事件的報導有多大程度的共享議題？

中國報紙的「新媒體事件」報導：範式與地區的比較

儘管中國目前缺乏關於新聞報導議程多元性的實證研究, 但並非沒有相關討論, 從新聞制度與媒介控制的角度出發, 中國報紙被認為存在較為明顯的「千報一面」現象 (童兵, 1994), 特別是在時政等硬新聞領域, 中國報紙之間實際上存在相當低的外部多元性, 它甚至不僅表現在類別化的新聞議題, 而且表現在具體的新聞事件或新聞故事 (乃至標題和圖片) 的重合上。但「新媒體事件」發端於網, 以「公民新聞」和「大眾輿論」為特徵, 儘管宣傳體制會以宣傳通知等手段抑制部分敏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感性新媒體事件的報導，但卻較少像以往對其它題材那樣以強制或命題方式指定一致化的報導內容，因此給其多元化留下了相對自主的「邊緣突破」空間。另一方面，「新媒體事件」的報導常規(routine)尚在形成之中，與傳統題材相對制度化的新聞「布點」與生產機制相比，新媒體事件的新聞生產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一項關於《南方都市報》「網眼」(該報集中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專版)文章的內容分析發現：作為「當日新聞」或「昨日新聞」報導的新媒體事件僅佔四分之一左右，大多數(58.7%)文章報導事件的時間與事件發生時間存在三天到一週的間隔，還有5.4%相隔甚至在一週以上(周葆華、肖淼，2012)，這似乎並不符合同新聞生產的「及時性」原則，但恰恰反映出傳統媒體及其從業者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判斷從網路中發現的新聞線索的價值，以決定是否將之搬上版面。基於這樣的邏輯，儘管本文並不會將新媒體事件報導的議程多元性與其它題材報導進行正式比較，但可以期待各報之間可能存在較高的多元性、特別是外部多元性。

那麼，什麼因素會影響中國報紙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的多元性差異呢？本文認為，至少有兩個因素值得關注：第一是媒體的新聞範式取向，第二是媒體所在的地區。首先，新聞範式是影響媒體報導內容特徵的重要因素。受科學史學者庫恩(Kuhn, 1970)對學科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範式」論述的啟發，新聞傳播學者提出了「新聞範式」(journalistic paradigm)概念，來表示在一個時代或社會對什麼是新聞、以及如何製作新聞的共享理解，這種理解通常被固化在規範新聞實踐的專業理念、組織常規或政策、以及現存社會秩序之中(潘忠黨、陳韜文，2004；Bennett et al., 1985；Reese, 1990；Tuchman, 1978)。在中國大陸，1949年後佔主導的是強調新聞傳媒宣傳喉舌功能的「黨的新聞事業」範式。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發生了深刻變革，市場力量開始成為影響傳媒的最重要驅動力之一，逐步侵蝕著黨報(party-press)意識形態，成為影響傳媒運作的重要機制。「市場化」範式強調傳媒具有的商業屬性，認同傳媒應以更實用的資訊、服務和娛樂服務受眾，以最大化傳媒的商業利益。在此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範式亦得以浮現，不過從組織機構角度，被視為專業主義範式的媒體屈指可數(李金銓，2004；陸曄、潘忠黨，2002；童靜蓉，2006)。

因此目前中國大陸的兩大新聞範式仍以「黨報」和「都市報」為主，前者更傾向於「黨的新聞事業」，後者「市場化」的色彩更濃。

研究者們已經從「新聞範式」的基本概念出發，區分黨報和都市報對新聞內容的不同影響，並證實了兩者在相關新聞議題（如農民工報導、愛滋病議題）上有不同呈現（李豔紅，2007；張明新，2009）。其基本邏輯在於都市報基於更強的市場性，會更積極地通過題材擴張與話語改變吸引受眾，會更積極地回應受眾需求。從這個基本邏輯出發，我們可以假設在從網路空間尋找並報導事件問題上，都市報應當比黨報更加積極。聶靜虹、王博（2013）在對中國媒體都市集體行動報導策略研究時也發現，市場化取向越強的媒體越傾向於在其報導中呈現新媒體相關的內容。因此儘管現有研究沒有討論到黨報與都市報在吸納新媒體事件上有何不同表現，但本文有理由提出如下假設：

研究假設一： 都市報「新媒體事件」報導的事件（H1a）、議題（H1b）、類型（H1c）及地域（H1d）內部多元性高於黨報。

另一個值得考察的因素是中國傳媒的地區差異。地域構成的資訊環境是傳播研究考察的重要因素（Kang & Kwak, 2003; Shah, McLeod, & Yoon, 2001）。就中國傳媒生態而言，地域代表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準、政治權力層級、媒介消費水準和傳媒競爭水準，對新聞內容呈現和受眾效果有顯著影響（Chan & Qiu, 2002）。因此在中國傳播研究中，針對以往研究只聚焦於單一地區 / 城市或將中國視為內部同質的單一整體，學者們開始呼籲「地理轉向」（geographic turn）——即關注中國內部政治、經濟和媒體發展高度的地區差異，展開地區比較研究（Sun, 2010; Zhao, 2008）。在分析中國傳媒制度創新過程時，陳懷林（1999）曾經根據「收益 / 成本比率」框架，闡釋傳媒改革並非跨地區同時展開，而是分區域先後漸進——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廣告資源發達的地區產生，然後擴散到其他沿海省市，最後才為內陸省區所採納。由於對「新媒體事件」的吸納與呈現體現著不同傳統媒體回應新媒體挑戰的能力和運作常規的創新（Singer, 2005），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同經濟發展地區的報紙在報導「新媒體事件」上也有類似的地區漸進與不均衡性。基於此，本文提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研究假設二：東部地區「新媒體事件」報導的事件(H2a)、議題(H2b)、類型(H2c)及地域(H2d)內部多元性高於中西部地區。

以上兩個研究假設討論的主要是內部多元性的差異問題，在外部多元性上，到底是同一範式取向的報紙之間在報導「新媒體事件」上更為一致(更低的外部多元性)，還是同一地區的報紙之間更加相似？從新聞範式對新聞選擇的規範性角度而言，有理由認為不同地區、同一範式的報紙之間可能具有較低的外部多元性；而從新聞選擇的「接近性」角度，同一地區的報紙之間又往往較為一致，但這裏有趣的是，與傳統題材的新聞不同，「新媒體事件」大都爆發於網路空間，它一方面具有與特定地區的緊密關聯(如當地的社會問題、線下行動等)，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被不同地域的人共同觀看，這是新媒體傳播的跨域特性所在，所以到底地方接近性在「新媒體事件」報導上是否仍起作用，也是本研究希望探索的問題之一。由於相關前人研究尚付闕如，本文對此提出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三：不同地域、相同新聞範式的報紙之間報導「新媒體事件」時的「外部多元性」分別如何？

研究問題四：同一地域、不同新聞範式的報紙之間報導「新媒體事件」時的「外部多元性」分別如何？

研究方法

抽樣

為實現對全國報紙「新媒體事件」報導較為系統和具比較性的分析，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方法。抽樣方面，首先，為覆蓋不同地域，我們按國家統計局劃分的東中西經濟區域分為三層，在每層內部將所包含的省(市區)按人均GDP排序，隨機選擇一個起點後按等距方法各抽出兩個省份，最終構成了一個包含六個省份的地區樣本——包括上海、廣東(東部)，湖南、湖北(中部)，以及四川、雲南(西部)；第二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步，根據CSM媒介研究(2012)「經常閱讀的報紙」調查，並兼顧不同新聞範式，在所抽中的省份分別選擇了最具代表性的省級黨報和都市報各一份，由此共獲得12份報紙(表一)。

表一 抽取報紙及其屬地與取向

地區	省份	黨報	都市報
東部	上海	《解放日報》	《新聞晨報》
	廣東	《南方日報》	《南方都市報》
中部	湖南	《湖南日報》	《瀟湘晨報》
	湖北	《湖北日報》	《楚天都市報》
西部	四川	《四川日報》	《華西都市報》
	雲南	《雲南日報》	《都市時報》

第三步，為防止電子版的刪缺問題，我們選擇了上述報紙2011年1-12月的紙質版作為分析對象。具體的抽樣為該時期內的隔週抽樣——以2011年1月第一個週一即1月3日為起點，連續抽出7天的報紙，然後每隔三週抽一週。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抽樣方法，主要是兩點考慮：一是獲得全年報導的代表性樣本，二是允許較為準確地考察單一事件在抽樣週中的報導情況，避免因其他常用的抽樣方法(如「組合週」)導致的在「外部多元性」測量上缺乏信度的問題。最終共獲得了9週(63天)、756期報紙。

編碼

本研究對新媒體事件報導的篩選主要遵從「發端於新媒體、或在發展過程中新媒體發生重要作用的社會事件」這一基本概念(邱林川、陳韜文, 2011)。由於本文主旨是考察新舊媒體互動，我們對「新媒體事件」採取較寬泛而非狹義的操作化定義，即在上述基本內核的基礎上沒有再附加其他限定條件(如是否批判權力)、也不趨向「新媒體大事件」(因為這一做法顯然會影響議程多元性的測量效度)。具體地，先逐一流覽每篇新聞報導中是否出現新媒體的標籤——包括新媒體平台(如「論壇」、「博客」、「微博」、「網」)、網路平台/公司具體名稱(如「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度」、「淘寶」)、新媒體內容/體裁(如「網路視頻」、「帖子」、「日誌」)，以及新媒體平台參與者(如「網友」、「博主」)；接著判斷新媒體在新聞事件中的角色即是否起到關鍵性作用，如作為新聞事件披露曝光、發生發展、熱議爭辯的平台，或者作為新聞事件中的行為主體，通過這一過程排除大量僅僅報導新媒體業界變動的一般性消息(如新產品上市)。最終共獲得了2,534篇有關新媒體事件的報導。

所編碼的具體類目包括：

一，事件命名。首先根據事件的基本要素(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等)判斷每篇報導所涉及的事件，然後參照新聞標題，並按照「人物+事件主要內容」(輔助地點等其他要素)的格式將之命名，例如「江蘇溧陽局長直播開房」或「昆明發改委官員身陷『豔照門』」等。

二，發生地域。記錄新媒體事件發生的主要地點，只記錄到省級層面。

三，議題歸屬。每篇新媒體事件報導最多可屬於20個議題範疇中的2個(包括本地/國內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商業、明星娛樂、教育、犯罪等)。編碼後，我們發現絕大多數新媒體事件報導都有明確的主要議題歸屬，因此在計算分布比例和議程多元性時，只考察該報導的第一個「主要議題」。

四，事件類型。新媒體事件的分類本身是新媒體事件研究的重要內容，從不同研究目的出發，研究者對新媒體事件的分類也不盡相同。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分類，包括楊國斌(Yang, 2009)從新媒體事件的行動(activism)特徵出發，將之分為民族主義、權益抗爭、公權濫用和腐敗、環境抗爭、文化爭辯、網路慈善、網路揭黑等；邱林川、陳韜文(2011)著眼於「經常出現」和「社會影響」兩個因素，將新媒體事件分為民族主義、權益抗爭、道德隱私和公權濫用四種類型(types)，並在後續分析中結合特定階級的實踐將之擴展到群體災難、個體無助、同歸於盡、集體行動等類型(邱林川，2013)。本研究在預研究中發現，上述基於個案研究對新媒體事件的分類並不能涵蓋每日報紙中所報導的新媒體事件類型。因此，本研究既吸收對新媒體事件行動特徵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的強調，也考慮到草根之外多元的行為主體，根據「行為主體」和「行為性質」兩個維度，採取「紮根」方式發展出了如下23個分類(表二)，並在預編碼得到檢驗後正式採用。與事件議題範疇相似，本研究允許最多編碼兩個類型，但在計算表二比例以及後文的議程多元性時，只關注該事件的「主要類型」。

表二 新媒體事件的類型及其報導分布(%)

	公權力	企業 / 機構	民眾		明星 / 名人
正面	公權善用 (12.27)	-	網民互助 / 慈善 (3.28)		-
負面	公權濫用 (25.30)	不良機構 (9.98)	民眾惡行 (8.96)	偏差行為 (1.54)	名人不良行為 (1.07)
中性	政府動態 (0.04)	網路行業 (3.31)	網路生活 (5.29)	網路文化 (9.27)	名人生活 (1.78)
衝突	民族主義 (0.24)	機構衝突 (0.83)	線民爭辯 (0.83)		名人衝突 (2.05)
隱私	領導隱私 (1.82)	-	公民道德隱私 (1.38)		名人道德隱私 (4.74)
維權 / 抗爭	-	-	個人維權 (2.21)	集體抗爭 (2.49)	名人維權 (0.95)
受苦	-	-	個人不幸 (0.29)		-

註：本編碼表中空白的部分，為實際編碼中未發現的類型。

編碼過程中，兩位研究生隨機選擇了約10%的報導(248篇)針對上述變數進行獨立編碼，根據Cohen's Kappa計算的信度係數分別為：.98(事件)、1.00(地域)、.90(議題)和.89(類型)。

議程多元性的計算

I. 內部多元性

在計算新媒體事件自身的內部多元性時，我們採用了「形式多元性」概念，即計算各報紙報導在全年範圍內出現的新媒體事件數量。這裏之所以不使用「比例多元性」來計算，是因為比例多元性主要考察的是報紙對不同新媒體事件的分配情況，但本研究數據顯示，報紙對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個新媒體事件平均報導篇數在1.02–1.27之間，這表明各報大多使用了相近的篇數對一個新媒體事件進行報導，因此採用「形式多元性」已足夠捕捉到各報之間在新媒體事件內部多元性上的差異。

在計算新媒體事件報導議題、類型和地域的內部多元性時，主要使用「比例多元性」計算方法。其原因在於，「形式多元性」對議題等三類多元性的分析並不合適。舉例來說，《解放日報》和《新聞晨報》的新媒體事件報導均涉及了20個議題，形式多元性指數都是20，但兩報給予不同議題的分配程度並不一樣——《解放日報》相比《新聞晨報》將更多的新媒體事件比例分配給了政治和經濟題材。相比之下，比例多元性不但考慮所涉及議題的總體數量，而且考慮了落入不同議題的分布比例，從而更能把握各報新媒體事件議題多元性的特徵。

根據以往研究(如McCombs & Zhu, 1995)，我們選取了Shannon's H「熵公式」來計算比例多元性。研究表明，該公式相比其他多元性計算公式，能夠更好地捕捉多元性在數量和比例兩個層次上的特徵(McDonald & Dimmick, 2003)。為使多元性指數更為直觀，本研究參照林婉瑩、李立峯(2010)的標準化策略，對既有公式裏得到的H值除以 $L_n(N)$ (N為議題、類型、地域的範疇數量，在本研究中分別為20、23和32)，從而將多元性數值標準化為0到1之間，0表示完全集中(如所有的新媒體事件報導都落入同一個議題範疇的時候)，而1則代表了最高的多元性(如20個議題範疇完全平均地各佔5%的報導篇數的時候)。公式如下：

$$H' = -\sum P_i * L_n(P_i) / L_n(N) \quad (\text{公式 1})$$

(N = 分類範疇數量， P_i 指落入i這個範疇的報導百分比)

為更好地觀測時間層面的變化，本研究對多元性的測量包括了「全年」和「每週」兩個層次(之所以不採用「每日」，是因為與一般題材的新聞報導不同，每日層次上的「新媒體事件」報導量過少)。

II. 外部多元性

在計算新媒體事件自身的外部多元性時，我們首先考察不同報紙對新媒體事件的共享情況——通過交叉表獲得12份報紙各自對所有新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媒體事件的報導情況(是或否)，然後再計算每一個事件對應的報紙數量。進一步，為使多元性數值之間具有可比性，我們使用了如下公式：

$$E_1 = 1 - N_{AB} / (N_A + N_B - N_{AB}) \quad (\text{公式 2})$$

(註：A、B表示同一地區或同一範式的兩家報紙， N_A 與 N_B 分別表示該報紙在特定時間內報導的新媒體事件數量， N_{AB} 表示兩家報紙共同報導的事件數)

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本研究是每隔三週抽一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某一週的新媒體事件不太會在往後的週中出現，所以我們只計算了週累計層次上各報紙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外部多元性，其平平均數已基本能反映全年累計層次上的多元性。

在計算新媒體事件報導議題、類型和地域的外部多元性時，主要使用經林宛瑩、李立峯(2010)修訂後的Sigelman和Buell(2004)「議程融合係數」。他們的計算方式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闡明。假設一個地區有A、B兩份報紙，他們報導的新聞只涉及政治、經濟、娛樂和司法這四個議題範疇，其中，A有50%的新聞落入政治議題，經濟20%，娛樂和司法各佔15%，而B有40%的新聞屬於政治，經濟10%，娛樂和司法各佔25%。在這種情況下，外部多元性的數值為：

$$E_2 = (|50\% - 40\%| + |20\% - 10\%| + |15\% - 25\%| + |15\% - 25\%|) / 2 = 15\% \quad (\text{公式 3})$$

公式中括弧內的數值是兩份報紙的新聞給予一個特定議題的比例的差異之和。這個總和被除以2之後，就變成0到1之間的數值，代表兩份報紙新聞議題的多元化程度。以此類推，我們可以分別計算年和週累計層次上新媒體事件報導的議題、類型與地域外部多元性指數。

研究發現

新媒體事件報導的總體狀況

在正式報告「新媒體事件」報導的議程多元性之前，首先瀏覽一下中國大陸報紙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基本狀況。研究發現：12份、75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期報紙，共報道新媒體事件2,534篇，平均每份報紙報導211篇(標準差為132.39)，平均每期(即每份報紙每天)報導3.35篇(標準差為2.10)。

議題方面：傳統媒體報導「新媒體事件」主要集中於本地/國內政治(15.19%)，其次是經濟商業(14.01%)，第三是明星娛樂(11.13%)，隨後依次包括文化(8.21%)、犯罪(7.02%)、教育(6.91%)、倫理道德(6.00%)、司法(5.88%)、交通運輸(5.88%)、公益慈善(3.24%)、事故災難(2.96%)、醫療健康(2.49%)、住房(2.45%)、勞動就業(2.41%)、國際政治(1.46%)、體育(1.30%)、資訊科技(1.18%)、環境(0.99%)、社區(0.71%)以及國防外交(0.59%)。

類型方面：報導最多的「新媒體事件」類型是「公權濫用」(25.30%)，其次是「公權善用」(12.27%)，第三是「不良機構」(9.98%)。「道德隱私」類合計佔到7.94%，但以「名人隱私」為主。而以往研究所強調的「權益抗爭」(個人維權+集體抗爭=4.71%)、「民族主義」(0.24%)等實際上在傳統媒體的報導版圖中並不彰顯。另一方面，不為以往研究所重視的一些類型——如「民眾惡行」(8.96%)比例則較高(詳見表二)。

地域方面：71.31%的報導交代了新聞發生地，覆蓋全國際除青海、西藏、澳門之外的31個省(市區)，其中主要的幾個省份當然與研究抽樣有關——湖北(9.75%)、四川(7.02%)、廣東(6.71%)、北京(6.63%，作為唯一非抽樣地區)、上海(6.55%)、湖南(5.88%)、雲南(3.47%)，緊隨其後的是江蘇(2.29%)、河南(2.01%)、浙江(1.97%)等。

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內部多元性

I. 事件的內部(形式)多元性

就事件形式多元性來看(表三)，2,534篇報導共涉及1,488個新媒體事件，平均每份報紙報導181件(標準差為106.05)；意味著平均每份報紙每天大約報導2個不同的新媒體事件。儘管本研究不涉及新媒體事件形式多元性與其他類型新聞的直接比較，但可以認為在總體上新媒體事件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報紙常規的報導內容。

不過，總體形式多元性並不代表其在各報之間均衡分布。通過表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三可以看出：形式多元性最高的是四川的《華西都市報》，報導的新媒體事件達到326件，佔到事件總數的21.91%；其次是上海的《新聞晨報》，316件，佔21.24%；第三是廣東的《南方都市報》，306件，佔20.56%。內部形式多元性最高與最低報紙的差值高達286，即一個只讀《華西都市報》的讀者比一個只讀《雲南日報》的讀者，在9週內可能多瞭解286個新媒體事件！

表三 全國12份報紙新媒體事件的內部形式多元性

報紙	形式多元性	比例(%)	日平均數	排名
總數	1,488		23.62	
地區比較				
東部	780	52.42	12.38	
解放日報	188	12.63	2.98	7
新聞晨報	316	21.24	5.02	2
南方日報	157	10.55	2.49	8
南方都市報	306	20.56	4.86	3
中部	498	33.47	7.90	
湖北日報	69	4.64	1.10	10
楚天都市報	259	17.41	4.11	4
湖南日報	50	3.36	0.79	11
瀟湘晨報	198	13.31	3.14	5
西部	538	36.16	8.54	
四川日報	71	4.77	1.13	9
華西都市報	326	21.91	5.17	1
雲南日報	40	2.69	0.63	12
都市時報	193	12.97	3.06	6
新聞範式				
黨報	490	32.93	7.78	
都市報	1,163	78.16	18.46	

不難發現，排在前六位的均為都市報，而後六位均為黨報。因此從新聞範式來看，都市報的新媒體事件形式多元性指數(1,163)明顯高於黨報(490)，前者在同一時期報導的新媒體事件數接近後者的3倍。就地區比較而言：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的東部省份(廣東、上海)報紙報導的新媒體事件形式多元性最高(780)；接下來是西部地區(四川、雲南)，共報導538個新媒體事件；中部兩省(湖北、湖南)共報導498個新媒體事件。所以H1a(都市報「新媒體事件」報導的事件內部多元性高於黨報)和H2a(東部地區「新媒體事件」報導的事件內部多元性高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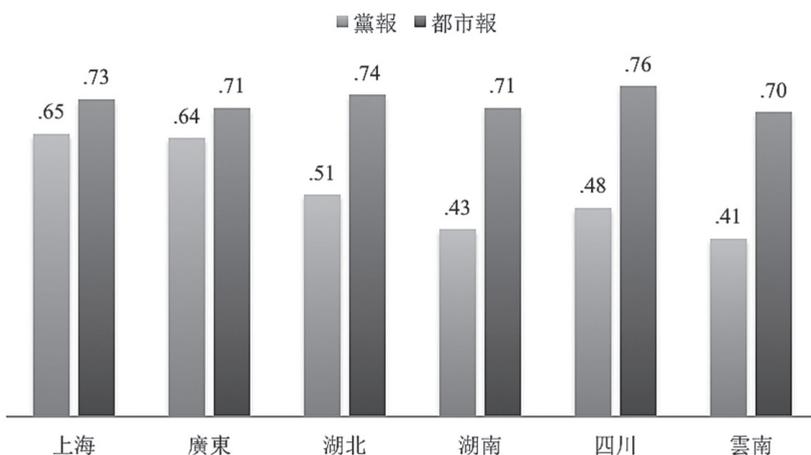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西部地區)得到證實。

II. 議題的內部(比例)多元性

根據前述「公式1」可以分別計算各報在週和年層次上內部議題分配的比例多元性。結果發現：在週層次上的議題內部多元性平均數為.62，各報之間差異較大——最低的《雲南日報》議題多元性指數僅為.41，代表其報導新媒體事件時議題非常集中；最高的《華西都市報》議題多元性指數為.76，說明其在每週報導新媒體事件時議題更為多元。而在年累計層次上，由於綜合了九週的結果，內部多元性都較週的層次上有升高，總體年累計的議題內部多元性平均數為.83。

圖一 新媒體事件報導的議題內部(比例)多元性(累計層次：週)



註：圖中多元性數值介於0與1之間，數值越高代表內部多元性越高。

為檢驗H1b，我們比較黨報與都市報在週層次上的議題內部多元性平均數。從圖一不難發現，在所有省市，當地都市報報導新媒體事件的議題內部多元性都高於黨報，只不過這種新聞範式之間的差異在中西部省份比在東部省份明顯更大。合計而言，黨報新媒體事件議題內部多元性平均數為.52(標準差=.17)，都市報為.73(標準差=.07)，t檢驗顯示兩者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程度($t = 8.32, p < .001$)。H1b得到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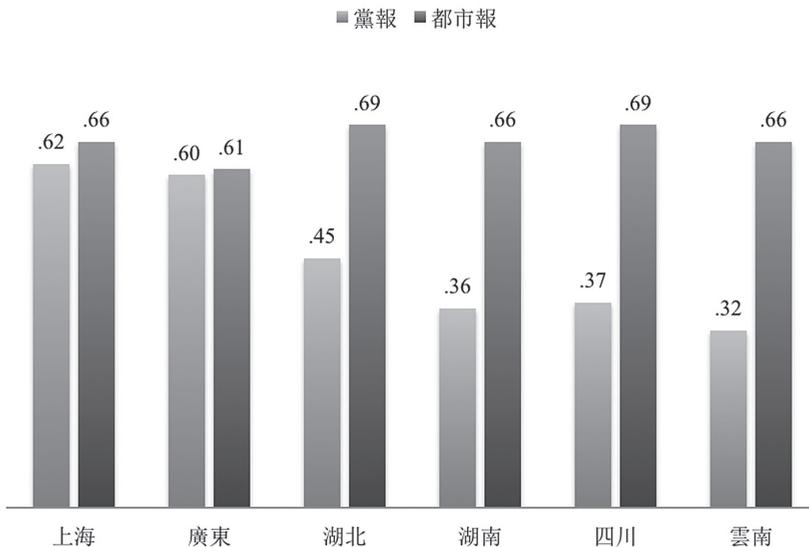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就地區比較而言，東部報紙新媒體事件議題內部多元性平均數為 .68 (標準差 = .11)，中部為 .60 (標準差 = .18)，西部為 .59 (標準差 = .18)，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 顯示三者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程度 ($F = 3.69, p < .05$)，不過中部與西部報紙議題內部多元性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H2b 亦得以證實。從圖一可見，東部報紙與中西部報紙之間的差異實際上主要體現在黨報上。

III. 類型的內部 (比例) 多元性

《解放日報》、《湖北日報》、《湖南日報》、《雲南日報》等四家黨報報導最多的新媒體事件類型是「公權善用」；除《新聞晨報》外的五家都市報和《南方日報》、《四川日報》兩家黨報報導最多的類型是「公權濫用」，其中《南方都市報》對該類型的報導佔比高達 38.82%；《新聞晨報》對「網路文化」類的新媒體事件關注最多。總體上，在週的層次上，各報報導新媒體事件類型的內部多元性平均數為 .56；而在年累計層次上，類型內部多元性平均數上升為 .72。

圖二 新媒體事件報導的類型內部 (比例) 多元性 (累計層次：週)



註：圖中多元性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數值越高代表內部多元性越高。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如圖二所示，儘管東部地區兩種新聞範式的報紙在類型多元性上相差無幾，中西部地區的黨報在類型多元性上則比其對應的都市報低了很多。t檢驗後發現：黨報事件類型多元性平均數(平均數 = .46，標準差 = .17)與都市報(平均數 = .66，標準差 = .08)之間整體上存在顯著差異($t = 8.19, p < .001$)。H1c 得到證實。

在地區比較上，東部報紙新媒體事件類型多元性平均數為 .62 (標準差 = .08)，中部為 .54 (標準差 = .17)，西部為 .51 (標準差 = .20)，方差分析(One-way ANOVA)顯示三者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程度($F = 4.78, p < .05$)。H2c 亦得以證實。與議題多元性的分析結果一致，地區間的差異實際上主要反映在黨報之間，中西部地區的都市報與東部都市報相比在類型多元性上並無遜色、甚至超過《南方都市報》(因該報集中於報導「公權濫用」型的新媒體事件)。

IV. 地域的內部(比例)多元性

一方面，從單一省份的比較看，所有報紙發生在本地的新媒體事件比例均最高，而將外地省份組合後，仍有六份報紙新媒體事件的發生地以本地為主(其中五份為黨報)，這說明儘管新媒體事件多發生於網路空間，「接近性」依然在傳統媒體吸納新媒體事件的過程中發揮作用；但另一方面，另一半的報紙(其中五份為都市報)已經呈現出外地高於本地的「全國化」趨勢，特別是廣東的兩份報紙報導本地新媒體事件的比例僅為 37.88% 和 20.07%，意味著其報導發生於外地的新媒體事件已經佔到七八成。總體上，在週的層次上，各報報導新媒體事件地域的內部多元性平均數為 .40；年累計層次上的平均數為 .54。儘管地域分布包括了更多的範疇(32)，但其內部多元性比議題多元性和類型多元性均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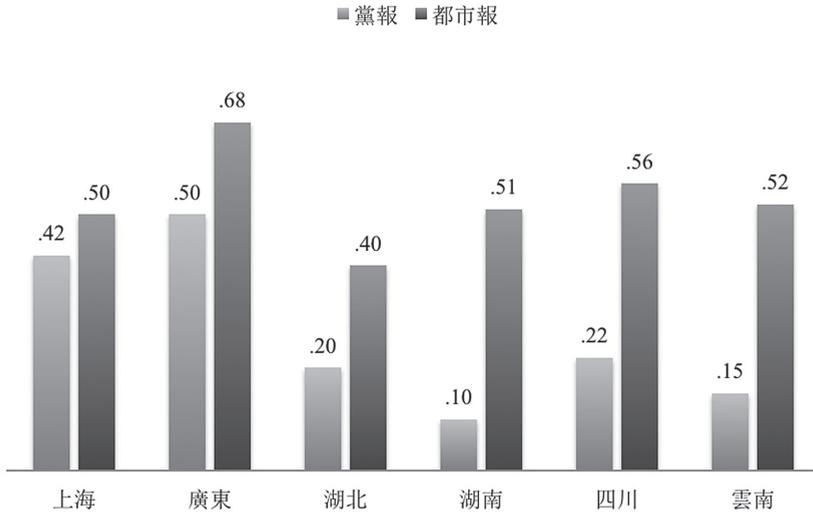
如圖三所示，各地黨報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的地域多元性均低於當地都市報。經t檢驗後發現：黨報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地域多元性平均數(平均數 = .27，標準差 = .22)與都市報(平均數 = .53，標準差 = .13)之間存在顯著差異($t = 7.50, p < .001$)。H1d 得到證實。

同時，東部報紙新媒體事件地域多元性平均數為 .52 (標準差 = .16)，也顯著高於中部地區(平均數 = .30，標準差 = .23)和西部地區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平均數 = .37, 標準差 = .22), 統計分析顯示三者之間的差異達到顯著程度 ($F = 10.84, p < .001$)。H2d 亦得以證實。

圖三 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地域內部(比例)多元性(累計層次:週)



註：圖中多元性數值介於0至1之間，數值越高代表內部多元性越高。

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外部多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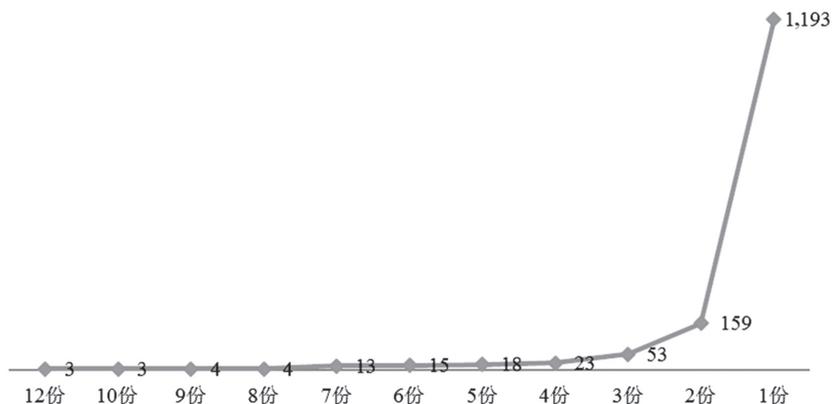
I. 事件的外部多元性

在計算新媒體事件自身的外部多元性時，我們首先考察不同報紙對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共享情況。

結果顯示(圖四)：在抽樣的九週內，全國各地12份報紙全部報導的新媒體事件數量僅為3件——「網曝故宮文物損壞」、「網曝金華『皮革奶』醜聞」以及「故宮盜案用新媒體告破」。11份報紙共享的新媒體事件數量為0。10份報紙都報導的新媒體事件有「網友質疑紅十字捐贈平台」、「全國動車票網上銷售」以及「百度文庫侵權事件」。9份報紙共同報導了「旭日陽剛《春天裏》版權糾紛」、「李天一被收容教養」、「廣西柳州暴打門衛」等四個事件。8份報紙共同報導了「藥監局副局長被雙開」、「網曝各地高速亂收費現象」、「郭美美事件」等四個事件。2至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圖四 全國12份報紙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共享情況



份報紙共享的新媒體事件數量從13到159不等，而有1,193個新媒體事件(佔事件總數的80.17%)只有一份報紙報導，沒有出現共享的情況。

從這個角度來說，目前中國大陸報紙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本身的層面上，並沒有形成較為一致的選擇，相互之間共同報導的情況並不普遍，外部多元性很高。為使多元性數值之間具有可比性，我們使用「公式2」來計算週累計層次上各報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外部多元性，其平均數結果為.93，非常接近1，說明各報之間總體在事件層面的外部多元性的確很高。

接著，為回答研究問題三，我們同樣使用「公式2」考察不同新聞範式取向的報紙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外部多元性。我們基於報導中的新媒體事件數對六份黨報/都市報進行兩兩運算，同一個新聞範式得到15個多元性數值，這15個多元性數值的平均數被作為某一週該新聞範式的新媒體事件外部多元性數值。結果發現(表四)：黨報之間的新媒體事件外部多元性指數(.95)高於都市報(.90)。這意味著，在選擇哪些新媒體事件進行報導的問題上，相比於黨報，各都市報之間的趨同程度更高。

同理我們計算同一地區、不同範式的兩份報紙之間的外部多元性(研究問題四)。結果發現(表四)：雲南的兩份報紙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外部多元性最高(.97)，接下來依次是湖南(.96)、四川(.95)、湖北(.95)、上海(.93)以及廣東(.83)。由此可見：越是內陸/不發達地區，

「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

當地黨報和都市報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越離散(分化)，而沿海發達地區的黨報和都市報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的融合(趨同)程度更高。

表四 全國12份報紙新媒體事件的外部多元性

報紙	事件	議題		類型		地域	
		週	年	週	年	週	年
地區比較							
東部	.88	.53	.34	.53	.36	.60	.42
上海	.93	.46	.26	.47	.31	.38	.18
廣東	.83	.60	.41	.59	.42	.82	.65
中部	.95	.65	.41	.66	.41	.45	.32
湖北	.95	.63	.42	.63	.40	.32	.19
湖南	.96	.68	.39	.69	.42	.57	.45
西部	.96	.63	.35	.61	.44	.55	.48
四川	.95	.55	.31	.53	.34	.51	.44
雲南	.97	.72	.38	.70	.53	.59	.52
新聞範式							
黨報	.95	.60	.28	.57	.28	.87	.81
都市報	.90	.41	.23	.45	.25	.67	.54

註：表中多元性數值介於0至1之間，數值越高代表外部多元性越高。

我們進一步來看地區與新聞範式哪個因素對新媒體事件的外部多元性影響更大一些。從表五中可以看到，每份報紙與其他報紙之間外部多元性指數最低(意味著議程融合/一致度更高)的往往來自同一新聞範式。以《新聞晨報》為例，它與《南方都市報》的融合程度最高(多元性指數為.90)，接下來依次是《都市時報》(.92)、《瀟湘晨報》(.92)和《華西都市報》(.93)，然後才輪到同處上海的《解放日報》(.93)；再如與《湖北日報》新媒體事件議程融合度最高的是《四川日報》(.94)，次之是《南方日報》(.95)，接下來才是同屬一地的《楚天都市報》(.95)。不過這一規律有時與地域結合在一起共同發揮作用。例如：對《解放日報》而言，它與同屬東部地區的黨報《南方日報》的融合程度最高(多元性數值是.93)，但與其他中西部地區黨報的融合程度又不及同屬上海的都市報《新聞晨報》(融合程度次之，多元性值=.93)。綜合來看，除了廣東的兩份報紙《南方日報》與《南方都市報》彼此的融合程度更高外，在大多數情況下，同一新聞範式報紙之間選擇新媒體事件進行報道的趨同程度往往更高。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II. 議題、類型與地域外部多元性

表五 全國12份報紙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外部多元性(週累計層次)

	解放 日報	新聞 晨報	南方 日報	南方 都市報	湖北 日報	楚天 都市報	湖南 日報	瀟湘 晨報	四川 日報	華西 都市報	雲南 日報	都市 時報
解放日報	-	.93 [#]	.93	-	.97	-	.96	-	.95	-	.97	-
新聞晨報	.93 [#]	-	-	.90	-	.95	-	.92	-	.93	-	.92
南方日報	.93 [*]	-	-	.83 ^{**}	.95	-	.94	-	.95	-	.96	-
南方 都市報	-	.90 [*]	.83 ^{**}	-	-	.90 [*]	-	.86 [*]	-	.84 [*]	-	.86 [*]
湖北日報	.97	-	.95	-	-	.95 [#]	.95	-	.94	-	.98	-
楚天 都市報	-	.95	-	.90	.95 [#]	-	-	.92	-	.93	-	.91
湖南日報	.96	-	.94	-	.95	-	-	.96 [#]	.90 [*]	-	.93 [*]	-
瀟湘晨報	-	.92	-	.86	-	.92	.96 [#]	-	-	.90	-	.89
四川日報	.95	-	.95	-	.94 [*]	-	.90	-	-	.95 [#]	.93	-
華西 都市報	-	.93	-	.84	-	.93	-	.90	.95 [#]	-	-	.90
雲南日報	.97	-	.96	-	.98	-	.93 [*]	-	.93	-	-	.97 [#]
都市時報	-	.92	-	.86	-	.91	-	.89	-	.90	.97 [#]	-

註：此表著重比較地理和新聞範式對報紙外部多元性的影響，故未列出省市和新聞範式都不相同的兩份報紙的新媒體事件外部多元性。多元性數值介於0至1之間，數值越高代表多元性越高。右上標「#」表示兩報在同一省市，右上標「*」的為與某報(列)外部多元性最低(意味著報導新媒體事件一致性更高)的報紙。

本文使用「公式3」計算各報新媒體事件報導議題、類型及地域的外部多元性。從表四可見：首先，無論是週還是年層次，黨報之間新媒體事件的議題外部多元性指數(年平均數 = .28)都高於都市報(平均數 = .23)。也就是說，相比於黨報，各都市報之間報道新媒體事件議題的趨同程度更高。就地區比較而言，東部地區報紙之間的議題外部多元性(年平均數 = .53)要低於中西部，即其議題一致性更高。

與此類似，從年累計層次來看，黨報和都市報所報導新媒體事件的類型多元性不高且相似(分別為 .28和 .25)。而從週層次來看，黨報之間的新媒體事件類型外部多元性指數(.57)略高於都市報(.45)，意味著與黨報相比，各都市報之間不僅在新媒體事件的議題、而且在類型上的趨同程度更高。無論在週或年層次上，東部地區報紙的新媒體事件類型外部多元性要低於中西部地區報紙，意味著它們有相對更一致的新媒體事件類型選擇。

在新聞範式比較上，都市報之間的新媒體事件發生地域的外部多元性(.54)也低於黨報(.81)。但在地區比較上，東部地區新媒體事件發生地域的外部多元性卻未呈現與議題、類型一致的趨勢——廣東的兩份報紙之間的地域外部多元性較高(.82)，這可能與《南方都市報》在拓展新媒體事件地域來源方面的獨特性有關。

結論與討論

綜上，本研究通過對中國大陸12家報紙的內容分析，以「議程多元性」為核心概念，實證考察了傳統媒體對「新媒體事件」的報導情況。文章系統分析了傳統媒體報導「新媒體事件」在事件本身、議題、類型和地域四個主要方面的多元程度，並通過不同地區、不同新聞範式報紙之間的比較，呈現出當下中國報紙吸納新媒體事件一幅相對完整的圖景。概言之，本文主要得出了如下結論：

首先，總體上，新媒體事件已經成為中國報紙新聞報導的重要內容，儘管具體的滲入程度因地區發達程度、新聞範式不同而存在差異。我們在抽樣的9週範圍內共獲得2,534篇新媒體事件報導，其中包含1,488個新媒體事件，12份報紙均參與報導了新媒體事件。中國報紙所報導的新媒體事件涉及20個不同的新聞議題，其中最多的三類議題依次是本地/國內政治、經濟商業和明星娛樂；涵蓋23個不同的事件類型，前三位依次是「公權濫用」、「公權善用」及「不良機構」；覆蓋32個不同地區，其中除報紙所在地外，較為集中的省份包括北京、江蘇、河南、浙江等。

其次，我們採用形式多元性和比例多元性兩個指標來衡量中國報紙「新媒體事件」報導的內部多元性，並進行基於新聞範式和地區的比較。結果發現：就事件本身的形式多元性而言，都市報吸納新媒體事件的程度遠比黨報活躍，前者報導新媒體事件的數量是黨報的3倍；而東部地區報紙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形式多元性是中西部地區的1.5倍；就事件議題、類型與地域的比例多元性而言，都市報在三個指標上的內部多元性都顯著高於黨報，而東部報紙的多元性也顯著高於中西部的報紙。值得注意的是，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議程多元性的差異與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紙新聞範式有關——至少就新媒體事件的議題與類型多元性而言，中西部地區的都市報已經與東部地區的都市報相差無幾，但中西部地區的黨報則與東部地區的黨報有著較大的差距，其結果也就造成了上述基於新聞範式(黨報 vs. 都市報)的新媒體事件內部多元性的差異在中西部地區更為明顯，在東部地區則較為弱化。

第三，就新媒體事件本身報導的外部多元性而言，總體上各報之間呈現出較高的多元性，表現在所有1,488個新媒體事件中僅有3個事件得到了12份報紙的共同關注，而絕大多數(80.2%)事件僅得到一份報紙的報導。「新媒體事件」在事件本身層面的外部多元性受到地區與新聞範式的影響——越是內陸/經濟不發達地區，當地的黨報和都市報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越離散，而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黨報和都市報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的融合程度則相對高一些；相比於黨報，各都市報之間的趨同性更高；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報紙報導新媒體事件時優先與同一新聞範式的其他地區報紙保持趨同，卻與同屬本地的其他新聞範式取向的報紙產生差異，可謂「身在曹營心在漢，一片丹心照範式」。

新媒體事件報導在議題、類型與地域層面的外部多元性呈現出兩點共性：一是都市報之間的外部多元性普遍低於黨報之間的外部多元性；二是除個別例外，東部地區報紙之間的外部多元性要低於中西部地區報紙的外部多元性。

由此可見，本文是「新媒體事件」研究中第一次較大規模從議程角度切入有關新媒體事件中新舊媒體關係的實證研究。儘管我們的研究沒有再進入具體的報導框架與話語層面，但已足夠提供我們關於傳統媒體如何報導新媒體事件的較為全面和系統的資訊。本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第一，與以往的同主題研究相比，本文超越了「新媒體事件」常見的個案取向與「大事件」偏好——即只聚焦那些影響巨大、耳熟能詳的特殊的「新媒體事件」，而對眾多的「新媒體小事件」缺乏研究。本文的分析和發現已經顯示這一視角的重要價值：例如，以新媒體事件的類型多元性為例，以往研究因為基於個案分析，多聚焦和強調特定的事件類型——如公權濫用、道德隱私、權益抗爭、民族主義等，而本研究則發現，從傳統媒體吸納的角度看，公權濫用型的新媒體事件

的確在報紙中廣泛存在，但道德隱私型就只有中等程度的存在，而權益抗爭和民族主義事件則非常稀缺；與此同時，不為以往研究所重視的一些新媒體事件類型，如公權善用、不良機構、民眾惡行等，則在傳統媒體的報導中較為普遍，這既體現了從新舊媒體關係角度研究「新媒體事件」的價值，也顯示了本研究注重基礎性、系統性的重要意義。

第二，系統性的重要基礎在於比較，本研究格外強調比較的視角，特別是引入新聞範式和地區兩個關鍵變數作為比較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本研究格外強調中國媒體內部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強調不應將變動中的中國媒體視為「鐵板一塊」，而是要看到它們內部的差異性。從比較的結果來看，本研究的確發現了「新聞範式」的巨大規範性意義：黨報與都市報無論在新媒體事件報導的總體數量、內部多元性還是外部多元性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表現在後者報導了更多、更多元的新媒體事件，在選擇偏好上也更為一致，其原因應當主要與都市報更多面向市場競爭和受眾興趣、從而影響其組織常規和從業者觀念有關；不僅如此，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和各地區政治經濟發展及媒介生態的巨大不平衡，東部地區報紙與中西部地區報紙相比，也報導了更多、更多元的新媒體事件，在選擇偏好上也更為趨同。這兩個發現都證明了「新媒體事件」報導背後的差異化邏輯——新聞範式和地區發展水準會影響傳統媒體吸納「新媒體事件」的規模與廣度，雖然總體上各地、各取向的報紙都在「擁抱」新媒體、從網路中尋找選題、都在報導新媒體事件，但它們的表現迥然有異。

更有意思的是，當「新聞範式」與「地區」兩個因素進行比較時，似乎前者戰勝了後者——不同取向的報紙雖然身處同城，面對同一批潛在受眾，卻在講述不同的新媒體故事。具有相同新聞範式的報紙之間在報導新媒體事件時的趨同性更高，它們與遠方的同類報紙「同氣相求」，這種「遠交近攻」的特徵是否與新媒體事件的特殊性有關（如新媒體事件「接近性」的弱化），可以在未來研究中進一步檢視。但在這裏，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對「新聞範式」所造成的報導差異不應固化理解，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新聞範式與地區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就會看到東部地區的黨報與本地都市報之間的差異已經減小，而融合度上升——體現在它們之間內部多元性的差異較小、以及外部多元性相對較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也就是說，當中西部地區的黨報與都市報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鴻溝」時，至少在對新媒體事件的報導上，東部地區的黨報已經在與都市報「悄悄」走近，這就提示我們對中國新聞生態中「黨報 vs. 都市報」差異的動態化理解。

第三，本文的分析不僅論證了傳統媒體基於新聞範式和地區差異造成的多元性，而且提示我們這種多元性可能與「新媒體事件」的基本內涵有關。正如邱林川、陳韜文(2011)強調，「新媒體事件」相比於經典「媒介事件」，不僅在於新的媒體(從衛星電視變成網路)，更在於新的組織(從權力壟斷到底層賦權)、新的機制(從精心計畫到難以控制)、新的類型(從「3C」到權益抗爭、公權濫用等)、以及新的效果(強化分化多於塑造共識)，那麼傳統媒體對新媒體事件的吸納也就是一個重構常規與範式變化的過程，也就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重建和發展關於新聞價值的判斷、形塑選擇共識，這也可能從一個側面解釋為何目前「新媒體事件」的外部多元性如此之高(特別是在事件層面上)；再比如，根據地域多元性的分析結果，新媒體事件的「本地化」特徵固然存在，但已相對弱化，即便沒有精確的比較研究，但大致可以認為，就其他內容的報導而言，報紙基本上是傾向於以本地為主，這也是新聞「接近性」的基本要求，但「新媒體事件」的報導卻給予外地新聞更高的比例。可能的一個解釋是新媒體事件本身基於網路空間，其參與者遍及全國，事件本身的地域性特徵弱化；另一個解釋是新媒體事件中「公權濫用」、「不良機構」等具有監督批評色彩的類型佔據較大比例，「異地化」報導也利於降低新聞管制的風險。也就是說，對「新媒體事件」內涵的理解，可以在考察其被傳統媒體如何報導中得到深化。

在最基本的意義上，本文之所以對傳統媒體「新媒體事件」報導的議程多元性進行系統的實證研究，不僅因其是媒體多元性、特別是內容多元性評估的一個重要指標；而且因為報導的「議程多元性」會對受眾層面的「議程多元性」產生影響(Chaffee & Wilson, 1976)，也就是說，媒體報導的議程豐富程度，會影響受眾感知與記憶公共事件/議題的豐富性。本研究已經發現，中國不同新聞範式、不同地區的報紙之間在「新媒體事件」報導上存在較大差異，也就完全可能在受眾層面帶給他們對新媒體事件的不同感知——一個「上海爺叔」與「雲南老伯」

從他們當地最熱門的報紙上所獲知的網路事件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不僅體現在數量上的較大落差，也體現在具體的議題選擇與話題呈現上，也就是說，經由報紙的仲介，相當多的中國受眾可能接觸到不同的「網路世界」，而這一點的社會影響無疑值得仔細探究。再者，如文獻綜述部分所說，關注中國傳統媒體如何報導「新媒體事件」，還具有把握中國「雙重話語空間」關係的潛在意義。一方面，當傳統媒體開始介入報導「新媒體事件」，已經說明「雙重話語空間」并非完全隔絕對立，也提示對「新媒體事件」的分析再也無法脫離對傳統媒體的分析追蹤，後者已經變成「新媒體事件」發展的重要環節與過程，甚至可以說，正是傳統媒體的介入報導促成了相當多網路事件的「事件化」或「大事件化」；另一方面，當「新媒體事件」變成傳統媒體的常規內容，其對傳統媒體和社會的衝擊力就會減弱，的確，就算從直觀上感知，中國近年有衝擊力的網路事件似乎有所減少，這既可能與社會轉型和網路管制有關，也與傳統媒體的常規化報導不無關係。

上述分析其實也預示了未來深化新媒體事件研究、特別是比較與動態研究的若干方向。第一，基於傳播內容與生產過程和傳播效果的連接，未來研究需要深化對傳統媒體報導「新媒體事件」過程與機制的新聞生產研究，同時考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受眾如何接觸「新媒體事件」報導，以及作為傳播效果的「受眾議程多元性」分別如何；第二，本文研究主要集中於議程層面，未來研究可以將之與對事件報導的「框架分析」結合起來，不僅研究「議程多元性」，而且研究「框架多元性」，從而對傳統媒體報導「新媒體事件」的「多元性」問題有更深入的理解；第三，正如上面討論到的，隨著媒介生態與管理體系的變化（如從微博轉向微信、網路治理的強化等），「新媒體事件」的傳統媒體報導需要放在歷時性的視角中加以追蹤性的研究，本文的分析發現與結論如何隨著時勢發展進一步變化，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概言之，本研究強調分析傳統媒體如何報導「新媒體事件」這一研究問題的重要性，並運用跨地區、跨範式的12份報紙較為系統地呈現了它們之間的內部多元性與外部多元性，我們希望這樣的研究可以為「新媒體事件」的比較研究積累一些基礎，同時呼喚「新媒體事件」研究繼續走向深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CNNIC (2017年1月22日)。《第39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取自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P020170123364672657408.pdf>。
- CNNIC (2017, January 22). Di 39ci zhongguo hulian wangluo fazhan zhuangkuang tongji baogao. Retrieved from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P020170123364672657408.pdf>.
- CSM媒介研究 (2012)。《中國100城市媒介消費地圖》，內部贈閱報告。
- CSM meijie yanjiu (2012). Zhongguo 100 chengshi meijie xiaofei ditu. Neibu zengyue baogao.
- 李立峯 (2009)。〈範式訂定事件與事件常規化〉。《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181–202。
- Li Lifeng (2009). Fanshi dingding shijian yu shijian changguihua.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181–202.
- 李金銓 (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Li Jinquan (2004). *Chaoyue xifang baquan: Chuanmei yu wenhua zhongguo de xiandaixing*. Xianggang: Niujin daxue chubanshe.
- 李豔紅 (2007)。〈新聞報導常規與弱勢社群的公共表達——廣州城市報紙(2000–2002)對「農民工」報導的量化分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116–123。
- Li Yanhong (2007). Xinwen baodao changgui yu ruoshi shequn de gonggong biaoda—Guangzhou chengshi baozhi (2000–2002) dui nongmingong baodao de lianghua fenxi. *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116–123.
- 林宛瑩、李立峯 (2010)。〈探討香港電視新聞中的議程多元性：本地、中國與國際新聞的比較〉。《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3期，頁109–138。
- Lin Wanying, Li Lifeng (2010). Tantaoyuanxing: Bendi, zhongguo yu guoji xinwen de bijiao.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13, 109–138.
- 邱林川 (2013)。《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路社會》。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Qiu Linchuan (2013). *Xinxi shidai de shijie gongchang: Xingongren jieji de wangluo shehui*. Nanning: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邱林川、陳韜文(2011)。《新媒體事件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Qiu Linchuan, Chen Taowen (2011). *Xin meiti shijian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周葆華(2011)。〈作為「動態範式訂定事件」的「微博事件」〉。《當代傳播》，第2期，頁35–38。
- Zhou Baohua (2011). Zuwei “dongtai fanshi dingding shijian” de “weibo shijian”. *Dangdai chuanbo*, 2, 35–38.
- 周葆華(2014)。〈中國新聞從業者的社交媒體運用及其影響因素〉。《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2期，頁34–53。
- Zhou Baohua (2014). Zhongguo xinwen congyezhe de shejiao meiti yunyong jiqi yingxiang yins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2, 34–53.
- 周葆華、肖焱(2012)。〈傳統媒體報導中的網路：特徵、議題與形象——以《南方都市報》「網眼」版內容分析為例〉。《新聞界》，第2期，頁3–8。
- Zhou Baohua, Xiao Miao (2011). Chuantong meiti baodao zhong de wangluo: Tezheng, yiti yu xingxiang—Yi Nanfang dushibao “wangyan” ban neirong fenxi weili. *Xinwenjie*, 2, 3–8.
- 陳懷林(1999)。〈九十年代中國傳媒的制度演變〉。《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第6期，頁6–14。
- Chen Huailin (1999). Jiushi niandai zhongguo chuanmeide zhidu yanbian. *Ershiyi shiji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6, 6–14.
- 陸曄、潘忠黨(2001)。〈成名的想像：中國大陸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17–59。
- Lu Ye, Pan Zhongdang (2001). Chengming de xiangxiang: Zhongguo dalu shehui zhuanxing guocheng zhong xinwen congyezhe de zhuanke zhuyi huayu jiangou. *Xinwenxue yanjiu*, 71, 17–59.
- 張明新(2009)。〈後SARS時代中國大陸愛滋病議題的媒體呈現：框架理論的觀點〉。《開放時代》，第2期，頁131–151。
- Zhang Mingxin (2009). Hou SARS shidai zhongguo dalu aizibing yiti de meiti chengxian: Kuangjia lilun de guandian. *Kaifang shidai*, 2, 131–151.
- 童兵(1994)。《主體與喉舌：共和國新聞傳播軌跡審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Tong Bing (1994). *Zhuti yu houshe: Gongheguo xinwen chuanbo gui ji shenshi*. Zhengzhou: Henan renmin chubanshe.
- 童靜蓉(2006)。〈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期，頁91–11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Tong Jingrong (2006). Zhongguo yujing xia de xinwen zhuan ye zhuyi shehui huayu.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1, 91–119.
- 潘忠黨、陳韜文(2004)。〈從媒體範例評價看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的範式轉變〉。《新聞學研究》，第78期，頁1–43。
- Pan Zhongdang, Chen Taowen (2004). Cong meiti fanli pingjia kan zhongguo dalu xinwen gaige zhong de fanshi zhuanbian. *Xinwenxue yanjiu*, 78, 1–43.
- 聶靜虹、王博(2013)。〈「媒介框架整合」：中國媒體都市集體行動報導策略研究——基於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中國傳媒報告》，第1期，頁104–119。
- Nie Jinghong, Wang Bo (2013). Meijie kuangjia zhenghe: Zhongguo meiti dushi jiti xingdong baodao celve yanjiu—Jiyu Guangzhou panyu laji fenshaochang shijian. *Zhongguo chuanmei baogao*, 1, 104–119.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llen, R. L., & Izcaray, F. (1988). Nominal agenda diversity in a media-rich, less-developed socie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1), 29–50.
- Bennett, W. L., Gressett, L., & Haltom, W. (1985). Repairing the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s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2), 50–68.
- Blumler, J. G., & Gurevitch, M. (1995). *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Boczkowski, P. J., & de Santos, M. (2007). When more media equals less news: Patterns of content homogenization in Argentina's leading print and online newspaper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4(2), 167–180.
- Chaffee, S. H., & Wilson, D. G. (1976). Media rich, media poor: two studies of diversity in agenda-hold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54(3), 466–476.
- Chan, J. M., & Qiu, J. L. (2002). China: Media liberaliza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In M. E. Prince, B. Rozumilowicz, & S. G. Verhulst (Eds.), *Media reform: Democratizing the media, democratizing the state* (pp. 27–46).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Choi, J. (2009). Diversity in foreign news in US newspap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vasion of Iraq.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1(6), 525–542.
- Day, A. G., & Golan, G. (2005). Source and content diversity in Op-Ed pages: Assessing editorial strategi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Journalism Studies*, 6(1), 61–71.
- Ferguson, M. A. (1984, May). *Issue diversity and media: Nominal, attributive and field diversity as correlates of media exposure and divers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vention, San Francisco.
- Hallin, D. C., &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 Z. (200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dual discourse universe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L. Willnat, & A. Aw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pp. 43–71). New York: Routledge.
- Herman, E. S. (1985). Diversity of news: “Marginalizing” the opposi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3), 135–146.
- Kang, N., & Kwak, N. (2003).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civic participation: Individual length of residence, neighborhood residential stability, and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with media u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1), 80–106.
- Katz, E. (1996). And deliver us from segment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46(1), 22–33.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Combs, M., Llamas, J. P., Lopez-Escobar, E., & Rey, F. (1997). Candidate images in Spanish elections: Second-level agenda-setting effec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4), 703–717.
- McCombs, M., & Zhu, J. (1995). Capacity, diversity, and volatility of the public agenda: Trends from 1954 to 1994.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4), 495–525.
- McDonald, D. G., & Dimmick, J. (2003).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divers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1), 60–79.
- Napoli, P. M. (1999). Deconstructing the diversity princip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4), 7–34.
- Peter, J., & de Vreese, C. H. (2003). Agenda-rich, agenda-poor: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nominal and thematic public agenda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5(1), 44–64.
- Reese, S. D. (1990). The news paradigm and the ideology of objectivity: A socialist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4), 390–409.
- Roberts, M., & McCombs, M. (1994). Agenda setting and political advertising: Origins of the news agend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3), 249–262.
- Roessler, P. (2008). Media content diversity: Conceptual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 S. Beck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31* (pp. 464–520). New York, N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hah, D. V., McLeod, J. M., & Yoon, S. H. (2001). Communication, context, and community: An exploration of print, broadcast and Internet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464–506.
- Sigelman, L., & Buell, E. H. (2004). Avoidance or engagement? Issue convergence in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1960–200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650–661.
- Singer, J. (2005). The political j-blogger: “Normalizing” a new media form to fit old norms and practices. *Journalism*, 6(2), 173–198.
- Sun, W. (2010). Scaling Chinese media: A geographic turn to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 537–54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Takens, J., Ruigrok, N., van Hoof, A., & Scholten, O. (2010). Old ties from a new(s) perspective: Diversity in the Dutch press coverage of the 2006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4), 417–438.
- Tuchman, G. (1978). Professionalism as an agent of legitim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2), 106–113.
- Voinché, T. C., Davie, W. R., & Dinu, L. F. (2010). Considering the sources in local television news: Diversity in coverage of hard and soft news. *Southwester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26(1), 99–109.
- 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A: Rowman & Littlefield.

本文引用格式

周葆華、呂舒寧(2017)。「新媒體事件」傳統媒體報導的多元性：基於中國大陸12份報紙內容的比較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0期，頁135–168。